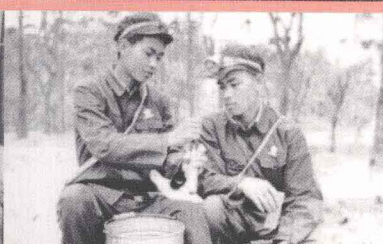


时尚与政治

广东民众日常着装时尚

(1966 - 1976)

孙浦东 著



时尚与政治

广东民众日常着装时尚（1966—1976）

孙沛东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彦青

封面设计：马淑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尚与政治：广东民众日常着装时尚（1966—1976）/ 孙沛东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9

ISBN 978-7-01-012589-3

I. ①时… II. ①孙… III. ①服饰—历史—广东省—1966~1976

IV. ① TS941.7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3781 号

时尚与政治

SHISHANG YU ZHENGZHI

广东民众日常着装时尚（1966—1976）

孙沛东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21.25

字数：309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2589-3 定价：43.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王 宁

在很多人眼里，“文革”是一场难以忘却的浩劫，一种挥之不去的精神创伤，一件不堪回首的历史往事。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的确，从一个常人的角度看，在深受其害以后还说“文革”好话的，会被人觉得不可理喻。受害者眼里的“文革”，必定是一场噩梦。但是，为了防止这场噩梦的再现，仅仅停留在受害者的立场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从一个学术的角度来剖析“文革”。学术的角度要求我们力求客观，而不是带着受害者情绪，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后者容易让我们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文革”。一旦如此，就会妨碍我们研究的客观性。这反而无助于我们发现“文革”的本质所在。孙沛东的著作，就是一部从学术的角度，对“文革”期间的一种奇特的同质化行为模式——时尚，以冷静客观的立场，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力作。

该作描述了一种异于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条件下的着装时尚。它高度同质，举国雷同，上行下效，整齐划一。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时尚，一种政治高压和意识形态裹挟下的时尚，一种自我归类的，从而避免自己被社会归入“另类”的，类似于动物保护色的时尚，一种可视的、无言的“自己人”的立场宣示，一种驱除恐惧、获取归属于“革命队伍”荣耀感的认同行动。这样一种时尚，与今天的时尚有什么不同？它背后的运行机制是什么？它导致了怎样的后果？这些问题，长时间以来都没有得到认真深入的研究。孙沛东选择这样一个题目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不但勇气可嘉，而且显示对自己

的学术能力有足够的自信。事实证明她是成功的。她的著作揭示了“‘文革’式”时尚的深层机理，对我们从更深的层次来反思“文革”，从一个侧面提供了鲜活的田野资料和深刻的理论提示。

在某种意义上，“文革”是一场由最高领导人在不经意间对人性之善恶所做的大实验。在这场大实验中，人们以“革命的纯洁性”的名义，从事着种种反文明、反人权的行动。尽管人们戴着“崇高”的面具，但人的各种阴暗的、丑陋的、凶残的本性，在“文革”这个大实验场暴露无遗（当然，我们不否认各种善心的存在）。诡异的是，人们可以以各种方式施害，但最后的结果是几乎所有人都难以避免受害。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相互伤害的境地。为了在这种相残社会生存，人们学会了虚伪，学会了违心，学会了表里不一，为的是在恶劣的环境下自我保护。而服装作为一种再普通不过的消费品，一旦选择不慎，也会遭致抨击或批判。于是，为了适应环境，自我保护，以革命的参照群体作为服装选择的依据，就是当时着装的行为逻辑。在“文革”中，工农兵就是这样的群体——在当时的意识形态话语中，他们是最有革命性的。于是，在“文革”期间，全国居民的着装显示出千人一面的外表，到处都是“蓝蚂蚁”、“黄蚂蚁”或“灰蚂蚁”。一个本来应该是鲜活的、色彩斑斓的世界，被活生生改造成一个单调无聊、死板无趣的世界。

“文革”期间的政治恐惧，并不能完全归因于领袖一个人。某人之所以崇高和伟大，是因为大家都跪着。的确，我们心理上的奴性，正是导致我们盲从，进而成为施害者，并最终成为受害者的原因。“文革”带给我们的警示意义在于，要让我们每个人都活得有尊严，不能未完成未竟的启蒙和未竟的理论反思。而文明社会已经证明了的普世价值，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承认它、接受它、普及它。其中，人权与法制，两个“文革”中可以肆意践踏的东西，正是这样的价值。

以冷静的态度来研究“文革”，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因为弄不好，连论文都没有地方发表，不但妨碍自己的学术生涯，而且还牺牲了许多机会成本。但事情总是要有人做的。幸运的是，有不少学者默默无闻地从事着这样

的事业。孙沛东就是其中的一位。尽管她的著作并非尽善尽美，能够有勇气从事这样的探索，就已经值得我们钦佩了。

是为序。

2012年11月4日于中山大学

目 录

序	1
绪 言	1
第一章 文献回顾	9
第一节 概 述	9
一、时尚与服装	9
二、着装时尚研究概述	13
第二节 西方着装时尚的社会学理论	15
一、阶级分化论	15
二、身份认同论	30
三、集体选择论	32
四、文化生产论	34
第三节 着装时尚的实证研究	35
一、国外研究	35
二、国内研究	37
第四节 小 结	38

第二章 理论视角、研究方法、框架与术语	41
第一节 理论视角	41
第二节 研究方法	44
一、质性研究法	44
二、二手数据分析法	47
第三节 研究框架	47
一、理论思路	47
二、写作框架	49
第四节 研究术语	50
一、总体主义：从极权主义、全能主义、新传统主义到总体主义	50
二、“情境”、“实践”	56
三、服装、着装和时尚	56
第三章 “文革” 着装时尚	59
第一节 军 装	60
第二节 “中山装”	68
一、正式的“中山装”	70
二、“军干装”	71
三、“同志装”	71
四、“企领民装”	72
第三节 “工人装”	73
第四节 “列宁装”	77
第五节 “红卫装”	81
第六节 “文革” 着装时尚的历史脉络	86
第四章 情境分析	91
第一节 消费政治	91
一、“需要” 绝对政治化与“消费” 绝对政治化	92

二、生产集体主义与消费禁欲主义	94
第二节 消费经济	96
一、高积累低消费的制度安排	97
二、控制收入	99
三、统购统销的制度安排	103
第三节 消费文化	108
一、政治唯美主义审美观	109
二、国家化身体文化	113
三、消费“耻丑主义”	115
 第五章 规训与顺从	119
第一节 着装作为革命趣味的表达工具	120
一、“红五类”穿军装	120
二、“红五类”穿“工人装”	125
第二节 着装作为革命趣味的建构工具	128
一、“黑色”追随者	128
二、“灰色”追随者	137
第三节 “奇装异服”与国家规训	142
一、“奇装异服”的类型及特点	144
二、“奇装异服”的标准及“合法性”着装的界定	154
三、国家对“奇装异服”的规训机制	155
第四节 总体主义背景下时尚的产生与传播机制	164
一、“模仿—固守”胜于“模仿—创新”	165
二、“补偿机制”让位于“淹没机制”	166
三、“社会认同”凌驾于“自我认同”	168
四、“共性”主导“个性”	168
五、“无选择的选择”替代“自由选择”	169
六、“文化中介人”即国家	170

第五节 国家对个体着装实践的控制逻辑	171
一、着装是表征社会区隔的重要手段	172
二、着装是实施国家权力的具体方式	173
三、着装是实行道德惩戒的有效途径	174
第六章 规训与反抗	177
第一节 反抗匮乏的生存性应对	181
第二节 衣领上的“革命”	189
一、反抗政治化着装——“颜色革命”	190
二、超越“去个性化”，追求个性和舒适	193
三、超越“去性别化”，反抗“性别淹没”	196
四、超越“去时尚化”，港澳台民间着装时尚的流入	209
五、社会征服与个性化着装	215
第三节 着装抗争与合法性	218
第七章 结论和讨论	222
第一节 结 论	222
第二节 讨 论	225
一、时尚的两维制度层面	225
二、时尚的阶级推动力和市场推动力	226
三、民族主义与服装消费	229
四、集体无意识与符号暴力	230
五、市场时尚与政治时尚	231
第八章 方法论反思	233
第一节 效度检验	233
第二节 信度检验	235
一、被访者所提供的信息的信度	236

二、样本的代表性	236
三、访谈资料的分析和整理	237
四、质性研究的结论	238
第三节 研究伦理	239
第四节 研究地域和时段	239
第五节 研究者省思	240
结束语	242
附 录	244
附录 1 访谈提纲	244
附录 2 被访者基本情况表	246
附录 3 图表目录	249
附录 4 部分访谈记录	251
致 谢	312
后 记	325

绪 言

——为人民服务，同志，我问点事。

——要斗私批修，您问什么事啊？

——灭资兴无，我照相。

——破私立公，照几寸？

——革命无罪，3寸的。

——造反有理，您拿钱吧。

——突出政治，多少钱？

——立竿见影，6毛3。

——批判反动权威，给您钱。

——反对金钱挂帅，给您票。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谢谢！

——狠斗私字一闪念，不用了。

这是1979年相声演员姜昆创作的相声段子《如此照相》中的经典台词，反映的是“文革”时期日常生活中普通民众照相的事。无论男女老幼，必须先与照相馆工作人员对革命语录，再背诵“老三篇”^①，之后练习照相的标准

^① 指《纪念白求恩》（1939年）、《为人民服务》（1944年）和《愚公移山》（1945年）。从毛泽东著作中精选出来，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单行本形式大量发行的三篇文章，旨在以某位先进人物为典范反复灌输和强化集体主义等价值观。

姿势，最后跳“忠字舞”才能离开照相馆。照相馆贴出“启事”：“凡到我革命照相馆照革命相片之革命群众，进革命门，照革命相，需高呼革命口号。如革命群众不呼革命口号，则革命摄影师坚决以革命态度不给予革命回答。此致革命敬礼！”不仅如此，照相馆还规定了四个“不照”：“烫发不照，抹口红不照，侧面相不照，逆光相不照”^①。这个相声曾经在电台、电视台反复播放，激起了大众的共鸣：“人们从电子管收音机中，从当时为数甚少的黑白电视机里听到看到了这段表演，感到亲切，也感到震惊，最普遍的感觉是认为节目说出了隐藏在观众内心深处而又未及说或未敢说的话。”^②

这则相声表明当时照相以“政治挂帅”，生活照必须照出政治。现在看来，说话之前先背诵革命语录的交谈方式有些荒诞不经，但其真实性却不容置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4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开篇序言中谈到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力量和意图在1949—1982年“革命的中国”的历史上的重要性。作者认为“与帝国和民国时期不同，在中国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下，没有一个生活的方面，也没有一个国内的地区不受中央当局坚决使中国革命化这一努力的影响。”^③西方学者似乎试图用“革命化”来概括这三十多年的历史，当时的中国大陆，以“文革”时期为例，是否确实是一个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生活”的“革命化”的历史？“文革”果真是人人革命，时时革命和处处革命吗？如果是，那么在人人都会背诵语录，并且能够熟练地应用政治话语进行日常交流的年代，在政治对人们日常生活世界的掌控似乎渗入每个细胞和角落的时期，着装作为普通民众（ordinary people）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面对的一件事情，是否也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他们如何着装？革命之外有休闲吗？我们需要祛魅化地对“文革”时期民众的日常生活进行研究。

在人类社会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时尚能够作为社会集体记忆的记录者。如果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文革”投射到时尚这枚棱镜

① 邱振刚：《姜昆：从〈如此照相〉到〈明春曲〉》，《中国艺术报》2004年10月2日。

② 同上。

③ [美]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4卷），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之上,将会映射出怎样的图景?总体主义国家及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与着装时尚的交融与碰撞,展现给我们的将会是何等的画面?

基于此,本研究从“文革”时期广东民众^①的日常着装选择切入,在对大量访谈资料、文献资料和图片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文革”期间,总体主义背景下国家及其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如何型塑和规训个体的日常着装行为?人们在这种特殊的制度背景中采取了哪些着装策略?非市场化条件下时尚的产生与传播机制如何?

一、研究缘起

(一) 理论缘起

斯宾塞(Spencer)最早研究政治与时尚的关系,他选取的切入点是“仪态和时尚”(Manners and Fashion)与政治的互动演进。^②他把礼仪的变革与社会软性控制中社会的教化、硬性控制中社会制度相联系。^③塔尔德(Tarde)从模仿的角度研究时尚,提出了时尚变迁论和时尚机械传播论。他认为古老的模式占压倒优势是风俗的时代;时尚的时代中优势常常站在新颖、奇异的模式一边。通过时尚,模仿就在生成的过程中得到释放。风俗向时尚过渡,然后又回归更加广泛的风俗。^④塔尔德没有解释时尚出现的原因。斯宾塞和塔尔德都将时尚与社会变迁相连。

凡勃伦(Veblen)提出的“地位炫耀论”,认为时尚是地位竞争的工具,从有闲阶级的炫耀消费入手,揭示了时尚在建构和再生产社会地位方面的功

① 尽管笔者从访谈和二手文献中收集了大量“文革”时期广东农民的着装资料,包括大量图片,但是,农民的着装并未成为当时民众着装时尚的组成部分,因此,本研究的“广东民众”主要指当时的广东城镇居民。

② 参见 Herbert Spencer, “On Manners and Fashion”, *Essays on Education and Kindred Subjects*, London: Dent/Everyman, 1966。

③ 参见王天根:《章太炎对本土经验的强调与早期“西方社会学中国化”》,《东方丛刊》2004年第1期。

④ 参见[法]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模仿律》,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章。

能。^① 齐美尔(Simmel, 有些译者译为西美尔)从阶级分化的视野分析时尚,认为时尚是一种社会形式,具有区分和整合的功能,将时尚与行动者的社会地位、阶级区分与群体融合联系在一起,其观点至今仍是时尚研究中最富有影响力的结论之一。^② 凡勃伦和齐美尔都将时尚与社会分层联系起来,属于时尚的功能分析。

布鲁默(Blumer)从集体选择的角度研究时尚,总结了之前的时尚社会学研究,提出以集体选择取代阶级区分,认为时尚是一种集体选择,将时尚与“现代性”和“时代精神”相联系。^③ 布迪厄(Bourdieu)是“霸权争夺论”的创立者,他提出时尚合法性这一概念,认为时尚场域中存在着霸权的争夺,他将时尚视为一种代码,具有社会区分的功能,反映了时尚行动者的文化资本。他第一次从生产和消费两个层面对时尚进行了分析。^④ 其他研究还包括麦尔森和卡慈(Meyersohn, Katz)的“时尚狂迷论”;坎贝尔(Campbell)的“体验周期论”;博德里亚(Baudrillard)的“价值溃决论”等等。

尽管有诸多社会学大家参与,但在学界,时尚似乎一直是一个冷僻的论题。国内除了周晓虹、郑也夫、高宣扬、王宁、徐连明等少数社会学学者外,^⑤ 时尚研究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对时尚的实证研究更是鲜见。时

① 参见[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② 参见 Sergio Benvenuto, “Fashion: Georg Simmel”, *Journal of Artificial Societies and Social Simulation*, Vol.3, No.2, 2000。

③ 参见 Herbert Blumer, “Fashion, From Class Differentiation to Collective Selection”, *Sociological Quarterly*, Volume 10, Issue 3, 1969, pp. 275–291。

④ 参见 P. Bourdieu, *Haute couture et haute culture*, In Pourdieu, P. (eds.), *Questions de sociologie*, Paris: Minuit. 1984, pp. 196–206。

⑤ 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研究时尚的学者有:王星:《百年服饰潮流与世变》,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唐建光:《解禁:中国风尚百年》,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唐建光:《时尚史的碎片》,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姜鹏:《时尚历史:闺阁里的那点春风》,故宫出版社2011年版;罗宏才:《中国时尚文化史》(先秦至隋唐),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年版。杨孝鸿:《中国时尚文化史》(宋元明卷),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年版;张繁文等:《中国时尚文化史》(清民国新中国卷),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年版。邓卓明等:《社会时尚与当代青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林剑:《上海时尚:160年海派生活》,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等。

尚研究尚未引起社会学界重视的主要原因是：首先，社会学诞生之初，就将研究兴趣投放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以及理性问题上。而西方社会一直认为对身体的修饰是无足轻重、琐碎不堪、非理性的，不值得认真对待。其次，时尚通常与“虚荣”、“炫耀”相联系，这种偏见使得着装时尚经常成为道德谴责的对象。再次，时尚通常与“女子气”有关联，人们总是认为妇女们更容易倾心于时尚这种“可怕的”乐事，许多时尚理论也都基于对女性时装的研究。在一个男权社会，时尚通常会被贴上“浅薄”和“愚蠢”的标签，不被认真对待。^①艾德华兹（Edwards）也认为“社会学对时尚的忽视，反映了时尚在艺术领域远比在社会科学领域更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对时尚最粗略的考虑也可以显示出它既作为个人的也作为社会的、既是主动的也是结构性的、既是创造性的也是受到其他因素控制的现象的社会学上的重要意义：一句话，时尚是我们研究社会结构与社会活动的一个最好的例子”^②。

事实上，时尚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机制，^③是社会学研究社会结构与个人行动的一个独特的切入点。从现实的情况看，作为与西方社会现代性相伴而生的一种现象，时尚无论是对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增长，还是对于个体微观的日常生活，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时尚理应成为社会学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此外，时尚的特性决定了社会学研究该问题的优势。一方面，时尚是一种建构性的力量，是个体身份建构的手段和工具，是个性和创新能力的体现；另一方面，时尚自身又是一种被建构性的现象，受到外部宏观制度、结构的影响和规制。以上两方面特点决定了一直关注结构与能动的问题的社会学，在研究时尚问题时具有一定的学科优势。

然而，检讨西方时尚研究的文献，我们发现：第一，上述研究结论源于

① 参见[英]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时髦的身体：时尚、衣着和现代社会理论》，郇元宝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 [英]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时髦的身体：时尚、衣着和现代社会理论》，郇元宝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 参见Herbert Blumer, "Fashion, From Class Differentiation to Collective Selection", *Sociological Quarterly*, Volume 10, Issue 3, 1969, pp. 275-291。

西方社会，形成于市场机制主导经济活动的宏观背景之下，属于市场化条件下的时尚理论，国家对时尚的作用不显著，它对实行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国家的时尚消费和文化很有解释力。而“1949年以后，我国在应对近代以来总体性危机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高度合一的总体性社会”^①。总体主义国家的渗透与干涉在“文革”时期达到巅峰，因此，将国家这个重要变量引入时尚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研究试图分析总体主义背景下，非市场化条件下时尚的运作机制。

第二，按照分析层次，西方时尚理论可以分为宏观的结构和微观的行动两种不同的视角。前者把着装时尚放在宏观的社会结构等背景下进行考察，强调宏观制度和结构对人们着装时尚的制约和影响；后者强调行动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把着装时尚看作是行动者展现个性的一种手段和工具，是个体自我表达和自我创造的产物。但西方理论没有凸显结构和能动两种视角的结合。

时尚作为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交接地，是窥探社会运行机制的窗口。时尚总是深深地嵌入特定的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进程，要理解时尚，就必须考虑时尚产生和传播的社会制度背景及其文化根基，这就需要对不同情境实践下的时尚问题进行本土化的考察。基于此，本书主要以“文革”时期广东民众的着装选择为切入点，从结构制约和行动者身份建构的角度，对人们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的着装实践做出理论上的解释，回应源于西方的着装时尚理论。

（二）现实缘起

笔者的祖父是贫农，父亲根红苗正，在“文革”中顺风顺水。母亲是地主的女儿，外祖父家在革命的洪流中深受冲击。当时“穷矮矬”与“高富美”的婚配模式并不少见，父母的婚姻是历史的偶合。作为一个“文革”之后出生的中国大陆人，笔者在成长过程中不时听到父辈有关“文革”的叙述。对“文革”的最初印象源自于父母双方“如果不是因为我成分好，我就不能……”和“如果不是因为我出身不好，我就能……”的诉说。这两种迥然不同的记

^① 郭于华：《克服社会恐惧症》，《社会学家茶座》2011年第2辑。